

土默特史料 蒙古人

第十三集

土默特志编纂委员会

土默特史料

第十三集
(人物志專輯)

土默特左旗

土默特志編纂委員會

封面设计

张 广 纶

封面题字

(蒙文) 乌云毕力格

(汉文) 文 浩

土 默 特 史 料 (第十三集)

土默特左旗土默特志编纂委员会编辑

土 默 特 左 旗 印 刷 厂 印 刷

一 九 八 三 年 十 月 出 版

2.1

FA43/07



杨植霖同志为蒙古族革命烈士贾力更题词

永发 摄



1982年10月
30日《土默特志》编
纂委员会召开了《土默
特志·下卷》分志初稿
验收会议，旗委书记补
生瑞同志作了发言。

图为大会会场

永发 摄



土默特史料 第十三集

写在前面..... (I)

吉雅泰..... (1)

高布泽博..... (26)

赵 诚..... (39)

孟 纯..... (49)

勇 夫..... (54)

康根成..... (68)

毕力格巴图尔..... (76)

恒 升..... (90)

目 录

一九八三年十月

李 振 华	(96)
李 国 玺	(109)
任 其 久	(113)
吉 合	(119)
姚 喆	(132)
云 秀 桐	(151)
编辑启事	(157)
题 词	补生瑞

吉 雅 泰



吉雅泰（1901——1968年），蒙古族，又名吉岱峰、吉亚太、王西、赵福、赵丹寿、赵延寿、老张等，在苏联东方大学时，曾叫阿其利也夫，在苏联内务部时，叫尔老宁。

一九〇一年十月（辛丑年九月廿九日），吉雅泰生于土默特旗三两村一个衰败的富裕农民家中。祖父任过章盖

（佐领），清朝光绪年间（一八八〇年左右）去世。死前家里有土地五顷多，雇长工五六个。父亲图孟额齐尔，弟兄三人；按旧俗蒙古人弟兄多了必须出一个喇嘛，因此三叔图孟道尔基入寺当了喇嘛。留在村里的两个弟兄分了家产，图

孟额齐尔又沾有吸鸦片及赌博的嗜好，所以生活每况愈下。

母亲生了两子两女，吉雅泰排行老三，乳名唤作虎子。虎子降生时，家业已经衰败。他从八岁起，父亲让他在村里利用春、冬两季读私塾，夏季、秋季放牧、下地。如此时断时续，到十二三岁，只念上《大学》、《中庸》。父亲看读书无望，又担心他长大成人后与其兄分家，因此力主让儿子去当喇嘛。但叔叔图孟道尔基竭力反对，他说，蒙古人丁一天天减少，这都与喇嘛教有关，长此下去，蒙古人要绝根。他主张让侄儿读书，于是接走虎子带在自己身边。

图孟道尔基在归化城（呼和浩特旧城）当喇嘛。虎子入了寺也算作小喇嘛，饮食起居都按规矩，对佛老、师父、师兄须得殷勤服伺。虎子的师兄，每到天黑，就要打盹，虎子服伺他时常借空读书，以至往往受其斥责：“一晚上连你一杯茶都喝不上一口；日后你要成了气候，我眼里塞个蒜头！”虎子放下书，忙给师兄倒水沏茶。师兄喝了，又打起瞌睡来；虎子又捧起书本。叔叔见他这样，故意问他将来喜爱什么，他说爱念书，叔叔首肯赞许。他支持侄儿在召里读了一年多私塾。

一九一五年，叔叔又把他送到土默特高等学堂读书。学堂里，虎子取名为岱峰。从入学到一九一九年，吉岱峰对政治发生了兴趣。适逢倒袁运动、十月革命、五四运动兴起之时，并且出现了孙中山、蔡锷一类知名人物。参加五四运动的土默特旅京学生回来又介绍了五四运动时逮捕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等人的情况以及袁世凯与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外交政策。这使岱峰深受感染，心里“对日本非常痛恨，对五四运动十分钦佩”。

一九一九年末，吉岱峰由土默特高等学堂毕业。因为考了第三名，土默特旗总管公署给了一个记名录事（即记名文书）。父母高兴得很，主张让儿子到旗总管衙门当录事，每月可以领到四元的薪水。吉岱峰不愿到衙门干事，一再和母亲说明自己想继续求学的意愿，叔父也支持他，父母也只得由他。

一九二〇年，吉岱峰考入归绥中学，编入十一班。“岱峰从小就是个大胖子，人极忠厚、热诚。那时中学生只有一种体育活动就是踢足球，他不能长跑，当了守门大将，他守得非常出色，在学生中很出名。”（见杨令德回忆）

在归绥中学，教语文的教员名叫李广庭（一说李广和），他三十多岁，是学校从北京聘来的。他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在课堂上讲的多是反对旧礼教、打倒孔家店等“惊世骇俗”的内容，并把《胡适文存》、《独秀文存》、《新青年》杂志，鲁迅、郭沫若的文章介绍给学生；章太炎、钱玄同的文章他十分推崇，引导学生也跟着学习。课下与学生又以兄弟相称，而与吉岱峰、李裕智过从甚密；吉岱峰觉得李广庭给自己灌输了新的知识，因而对他十分敬仰。寒假时，绥远都统马福祥以李广庭反对孔圣人、宣传过激思想之名把其驱逐出境。吉雅泰称：在中学这一年，自己才开始懂得什么叫革命。

一九二二年夏，土默特旗总管府给吉岱峰颁发骁骑校委任状。

下半年，归绥师范学校创办。吉岱峰为减轻叔叔的经济负担，报名投考这一官费学校。考的成绩很好，但因系从中学报考，放榜时取消其录取资格。他和一起报考的同学杨令

德四处呼吁，上书学务局（后改为教育厅），中学的几位老师也奔走说项，终于被正式录取。

一九二二年五月七日，“二十一条”签订七周年，归绥中、小学掀起纪念国耻活动，学生们上街宣传演说，示威游行。五月八日，学生们到大北街砸了敢于经销日货的“盛行时”洋行。吉岱峰积极参加了这次斗争。

一九二三年暑假，蒙藏学校派人来归绥招收新生，吉岱峰立即报名。据本人谈，他“先于一切同时报考的同学去了北京”。

当时，北京蒙藏学校把持在蒙藏院总裁恭桑诺布尔王爷手中，学校的官费有名无实，进步的教员校长被排斥，半年中换了四个校长。后来，换来一个警察局的王维周当了校长。学生们赶走王维周，而他的继任也照样腐败，依旧贪污伙食费。于是，四百名学生走了大半。生活费朝不保夕，想读书无法维持，因此吉雅泰常常同几个知心同学谈将来，企求找出路，并曾计议通过土默特旗总管荣祥、旗里的旧军人福潭，请求都统马福祥在绥远招兵。地方绅士反对此举，没有成功。马福祥为扭回面子，让荣祥当垦务局长，开放莎勒穆楞（大小文公、召河）草原。吉雅泰及他的好友想在开发的新地中弄块一千五百亩的土地组织新村，日日谈组织办法，以至谈到在新村几点起床，起床时是打铃还是吹喇叭……

后来，土地未放，马福祥让荣祥任萨拉齐县税务局长，荣祥让吉雅泰担任了莎县东门的卡长。蒙藏学校前途渺茫，其它学校又念不起，官场混事也十分厌恶，这时吉雅泰处于

徬徨之中。

蒙藏学校的同学给吉雅泰写信，告诉他学校形势好转，吉雅泰当即又返回学校。学友们津津乐道蒙藏学校已经有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又说共产党里还有很出色的人才。吉雅泰听了很快请求入团，经韩麟符、李渤海介绍，并经团员大会通过，即被吸收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此后，他就以党团活动为中心，“学习成了附带的事”。在学校的团组织内，他担任过团小组长和团支部委员。

中共北方区委李大钊、邓中夏、赵世炎等对蒙藏学校的工作十分关心。邓中夏、赵世炎常去蒙藏学校讲演，指导工作，李大钊也有时来校参加会议。北大三院经常举办的各种报告会、讲演会，蒙藏学校的党团员也多去参加。给吉雅泰印象最深的两次讲演，一次是李大钊出席了第五次共产国际会议，从苏联回国以后在北大三院礼堂所作的讲演，他报告了新建成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情形：在击败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后，正从事巨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星期六义务劳动日已经蔚成风气，各民族的平等业已出现……，还有一次是赵世炎的讲演，他说，“将来我们要建立内蒙古的红军，建立蒙古苏维埃政权”。这些，使吉雅泰深受鼓舞和教育，使他“对共产主义的前途”充满了“乐观、胜利和坚定不移的信心”。

李大钊对吉雅泰等同学很熟悉。见了他们，常常拍拍他们的肩膀，鼓舞他们“好好干”，吉雅泰等因为年轻，常表示要立即开展武装斗争。大钊笑着安慰他们，时机还不成熟，要冷静。并说在参加运动的同时，要注重理论学习和业务课

程的钻研，以备回内蒙古参加革命。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孙中山应北京陆军检阅使冯玉祥的邀请北上，在他所发表的《北上宣言》中，接受了中国共产党于一九二三年提出的召开国民会议的口号，正式提出了“召集国民会议，以保中国之统一与建设”的主张，建议在国民会议召开之前，应先召集一个预备会议。一九二五年初，全国掀起了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人民运动，中国共产党北方区为了欢迎孙中山北上、宣传国民会议改组后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发动蒙藏学校青年投入这个运动，并派吉雅泰回绥远地区组织“绥远国民会议促成会”。

在绥远国民会议促成会上，吉雅泰被选为绥远省出席全国国民会议促成会代表兼秘书处秘书。一九二五年三月，他同这次会议选出的另外三名代表奎璧、赵诚、崇德臣到北京出席了旨在反对段祺瑞“善后会议”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会下，吉雅泰等得到李大钊的亲口指示，要他们在会上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提倡关税自主等主张，贯彻中共四大确定的“扩大左派，批评中派，反对右派”的方针。

国民会议闭幕后，李大钊派吉雅泰回绥远地区开辟工作。当时正处于国共合作时期，他被指派为国民党绥远特别区（即后来的省）党部执行委员，办公地点设在归绥巧尔齐召的小南院，院门口挂着国民党绥远特别区党部的牌子。据本人忆述，实际上以作共产党工作为主，是受“党组织指派到绥远张家口工作，任中共内蒙工委书记”（一说中共绥远临时工委书记）。（当时，国民党员张国宝也说，“吉雅泰

他们搞的是共产党的组织”，张要“青年们不要误入迷途。）中共内蒙工委下辖归绥、土默特旗、莎县、和林、武川五个旗县工委，归绥县工委书记赵授恩，土默特旗工委负责人崇德臣、孙承业，莎县工委书记李瑞，和林工委临时书记万寿，武川县工委书记温财旺。同年，中共北方区委派何资琛以及共产国际代表瓦切尔劳夫到绥远检查工作时，已经有了这五个旗县工委。

“五·卅”惨案发生后，归绥城内以中共绥远工委为核心，成立了“五卅爱国运动委员会”，很快组织了声援上海工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示威游行和宣传募捐活动。吉雅泰参与领导了这次运动。在反帝大游行中，示威群众在街头高呼口号，捣毁了英日合资的“和记”洋行，拔下洋行门上悬挂的日本国旗，游行队伍集中到舍力图召，举行群众大会。吉雅泰在会上发表演说，他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残杀工人的暴行。会上群情鼎沸，一举把从和记洋行门上拉下的日本国旗撕碎。会后，示威群众又走上街头。这次运动持续了一月之久。归绥城共募捐一万多元，全部寄给上海工人。

在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吉雅泰常以国民党绥远省党部名义，召集党团活动分子在巧尔齐召开会，研究开展农运工作，组织人员到乡下建立农民协会，开展减租争地反对剥削的斗争。

为开展农运之事，吉雅泰自己也常去农村。姑母所在的什报气村就是他常去进行工作的地方之一。一九二五年下半年，该村汉族少年杨植霖考入归绥五族学院中学部。杨认识吉雅泰，常去巧尔齐召小南院吉的办公室；吉给他讲解革命道

理，让他看《响导》、《犁头》等共产党办的刊物，接触革命思想。杨家贫，父亲令其年终退学回家打柴种田。吉雅泰给五族学院教务长杨绍萱写信，从中周旋，使杨植霖住入公费待遇的师范班，恢复了学业。

一九二五年十月，以白云梯、郭道甫为首，在共产国际代表瓦切尔劳夫的指导下，成立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初称内蒙古国民党）。中国共产党派江浩等四人为首席代表出席成立大会，蒙古人民革命党也派有代表参加。会前，为成立该党，吉雅泰曾到李大钊家里请示，大钊指示他参加这个组织，并在其中发挥作用。于是，吉雅泰以土默特旗代表身份出席在张家口召开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内蒙古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同年冬，中国共产党为广泛团结各民族劳动人民开展斗争，在张家口以热河、察哈尔、绥远为中心，组织了“农工兵大同盟”。在农工兵大同盟的成立大会上，李大钊被选为书记，赵世炎、韩麟符被选为副书记，吉雅泰以及李裕智、王仲宣、陈印潭等二十余人中央执行委员。大会开会期间，王仲宣通知吉雅泰，“你由团转党，已经得到批准”（介绍人是韩麟符、王仲宣），从此，吉雅泰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会前，吉雅泰曾给赵授恩布置，组织土默特旗出席会议的农民代表到归绥学习受训，而后到张家口参加会议；会上，他给赵授恩农民运动材料，让回去开展宣传发动工作。赵授恩按照他的吩咐，到萨拉齐县同李锐等人组织了一个国民党分部，进行发动农民的工作。

一九二六年元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

会。吉雅泰以绥远代表的名义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同行的有李裕智、邓颖超，于树德、李国瑄、范鸿杰、韩麟符等。参加这次大会的共产党员在农民运动讲习所召开自己的组织会议，吉雅泰参加了会议，恽代英、邓颖超等人的发言使他十分感动。吉雅泰还和其他代表参观了邹鲁（国民党右派）办的一所学校，对刻在礼堂上的“在明明德”的校训甚觉刺眼。

离开广州以后，吉雅泰到张家口准备出席农工兵大同盟联席会议。恰遇冯玉祥的国民军由张家口撤退，党决定热察绥内蒙的党组织随国民军一同暂时撤退，吉雅泰随之也撤到包头。

初冬，冯玉祥的国民军为奉军所迫，从包头西撤。同时，白云梯、郭道甫和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机关也向银川撤退。当走到包头西边百十里的寒胜窑子村时，被已经收编为骑兵某路的张老摇匪部把所有武器、给养及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的印章铃记一起抢走。白云梯、郭道甫重返包头，让吉雅泰、李裕智前去说项。吉雅泰、李裕智去同张老摇交涉，要回印信。不料路上碰石友三部，错将吉雅泰、李裕智视作“绿林”，把其马匹印信尽行抢去，吉雅泰一再说明印信系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党部的，但对方还坚持要到五原见石友三军长。到了五原县城心桥，吉雅泰被开释；李裕智因身着游击副司令服装，须见石友三（说清有几支骑兵游击队）。次日早，经吉雅泰催促白云梯要回李裕智。他们与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党部人员会合，于同年冬和国民军一起撤到宁夏。

在宁夏，吉雅泰等共产党员受到白云梯的排挤打击，白

并在共产党的组织中派入奸细。一九二七年春天，吉雅泰同王瑞符（喀喇沁蒙古人，黄埔军校毕业生）以及王的随从副官杜祥三人，带着国民军给绥包镇守使满泰和国民军的留守道尹邓长耀的介绍信回到绥远。吉雅泰通过赵授恩等，发动归绥西区农民，掀起大规模的反清丈斗争，迫使当局让步。

一九二七年春天，中共党员、游击司令陈印潭约吉雅泰在归绥旧城美人桥附近一家会面，他要和吉雅泰商谈他去汉口出席中共五大向大会报告的补充内容，吉雅泰也打算为之送行。他们会面不久，几个便衣队的队员进来，劈口就问：

“谁是吉雅泰”，吉雅泰看出对方并没有掌握底细，就矢口否认里面有姓吉的，说自己姓赵，是土默特旗小学的教员，其余三人是土默特旗总管公署的科员。便衣特务们见吉雅泰神情自若，就开始逐个盘查另外三人。吉雅泰趁此机会，走近痰盂，弯腰抽鞋，就势把身上的图章藏了起来。

在盘查过程中，土默特旗总管公署的科员准确地答出了夜间通行的口令。特务们不甘心一无所获，决定把吉雅泰等带走对证。由三个特务打头，四个特务压后，押着他们向总管衙门走去。走到圪料街，路狭人多，街灯昏暗，吉雅泰猛地闪进入群，拐进小巷向西溜走。这夜，驻军在街道上正动员车马拉脚，路上行人乱杂，吉雅泰与那些军人擦肩而过，混出了归绥旧城的西口子。当晚，吉雅泰赶到城西四十里外的白塔村岳父家过夜，次日又乘火车到了包头。被押的另外三人因都有合法身份只得放走（奉系第三十一军军长郑泽生正打算收编陈的部队，因此没有关陈，其余二人系一般公务员，对诉后也便放了）。

“四·一二”之后，绥远政局发生变化。商震都统随着